

# 韩东 先锋已至花甲之年

文 高佳馨



韩东

诗人、小说家。1961年生于南京。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。著有小说集《西天上》《幽暗》《狼踪》，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，诗集《吉祥的老虎》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等。

前不久，韩东携全新中短篇小说集《伪装》亮相文坛。该书包括八篇精彩故事，主题多元，从暮年婚姻到青春散场，从中年危机到亲友悼念，深刻描绘出当代人的聚散离合与生活悲喜。同时，他的诗歌创作心得《诗人的诞生：韩东的诗歌课》也与读者见面，教授了实实在在、可实践应用的诗歌创作方法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这样评价韩东的作品：“当中国文学随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、经济转型而经历复杂变化时，韩东以他的写作拓展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能力，提高我们对复杂经验的把握能力，体现了不竭的先锋精神。韩东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保持着创造力，总是能给同时代的人从独特的角度提出启发，有时甚至是质疑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的文学一直需要韩东这样的艺术家，在观念上、在眼光上，能够有力地启发我们。”

## 凭借一首诗声名鹊起 以口语化的词句消解意象

与苏童、叶兆言、毕飞宇等一众生活在南京的作家相比，韩东虽出生、居住都在南京，但在他的作品中，却几乎找不到南京的印记。他说：“我对南京没有那么高的认同感，我只是在这里生活，既不是用南京话写作，也没考虑过要把南京的城市地理和特色融入写作中。”而幼时随父母下放的苏北洪泽县，才是他写作的重要背景。

韩东的父亲方之也是一位作家。韩东记得自己幼年时，父亲常跟朋友在家谈论文学或有趣的事，那种谈话的气氛令韩东着迷，他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旁边，听得投入。父亲有一些书，包括《静静的顿河》，韩东很小就读过，当然也是似懂非懂。他回忆：“我的美学风格，我的文学视野，很多都来自少年时代，那种生活背后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，不断日积月累，建立起来。当我回忆并进行选择，会产生某种冲动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意识。”

8岁那年，韩东和父母、哥哥一起从南京来到洪泽县，变成了农村户口，见识了乡村野趣，却无法融入周围小伙伴的群体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地自己玩。上中学时，他表现出对画画的兴趣，父亲很高兴，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教韩东画画，希望他能练就一技之长。

韩东遗传了父亲身上驾驭文字的基因，但父亲对此的态度是，既不赞成，也不禁止。“我小时候，父亲没有刻意地培养我，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将来不种地，能进厂当个工人，一个月三四十块钱工资，就不错。”

1978年，韩东在洪泽县参加高考。父亲对他说：“如果考不上大学，就要回农村从事农业劳动，干农活，修理地球。”结果，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，当时整个洪泽县的文科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重点大学。

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一个文学社团，名为“云帆”，取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之意，并不活跃。韩东加入其中，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探讨小说、诗歌。文学协会会员少，活动也少，他们在校园里贴出告示，招收文学协会会员，仅仅两天，招来七十多人。

1979年，韩东开始写诗。最早受朦胧诗影

响，之后逐渐建立了独立的思想意识，想写不一样的东西，于是抛开朦胧诗那套写法，走自己的文学道路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的陕西财经学院。1983年，22岁的韩东写出了诗作《有关大雁塔》，在诗坛声名鹊起。这首诗犹如一篇与朦胧诗彻底决裂的檄文，韩东摒弃了词语的堆砌与情感的抒发，以口语化的词句消解了大雁塔固有的文化意象，抒发了平民化的生命体验。

后来，每当有人谈起韩东的诗，《有关大雁塔》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。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朱栋霖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：1917—1997》中写道：“《有关大雁塔》是最早对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记述……这种局外人似的冷漠姿态显然解构了朦胧诗代表诗人杨炼《大雁塔》中悲剧英雄的崇高。”

在西安工作一年后，韩东调回南京某高校，教授马列哲学。1985年，他与诗人于坚联手创办诗刊《他们》，形成了“他们诗群”，认为诗到语言为止，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。韩东也成为“第三代诗歌”的代表人物。在此之前，“第一代诗歌”以艾青、臧克家为代表；“第二代诗歌”则以北岛、顾城、舒婷等为代表。

## 平民化的创作思想 取自日常，高于日常

就在《有关大雁塔》发表的同一年，韩东的第一篇小说《助教的夜晚》发表于《作家》杂志。他回忆：“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小说比诗读得多，从小说里汲取的营养也比从诗歌里汲取的多得多。因为小说有语言，有价值观和世界观，也有日常生活，呈现的是整体的世界。有时我觉得诗歌短小的形式以及即兴的东西容量不够，有一种有劲儿使不出来的感觉，那就写小说吧。”

他的《障碍》《在码头》《古杰明传》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，他也同朱文、李冯、顾前等人一起成为“新生代小说”的代表作家。随后，他开始写长篇小说，推出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《知青变形记》等六七部作品。

韩东的小说体现了他平民化的创作思想，大抵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，从日常语言生发，最终高于日常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，有的只是市井生活的再现，吃喝拉撒、婚姻爱情、生老病死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在这些琐碎的、细微的生活状态中，捕捉到了人性的复杂、现实的淡漠。

韩东认为，小说是虚构的，虚构就代表了一种颠覆，他举例说：“比如在现实生活中，坏人坏事，偷鸡摸狗，特别令人厌恶，但是在小说里，可能写出来就有几点儿好玩，有意思；反之，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你会很愿意和他交流、相处，但是在小说里写一个完美无缺的善人，就可能让人厌恶，让人觉得不真实。小说里面一个人死了，在现实世界里肯定是假的，但这个假，在小说故事里就是真的。”

和很多先锋作家不同，韩东也写了一系列以爱情及男女关系为主题的小说，包括《我的柏拉图》《明亮的疤痕》《我和你》等，他认为：“写爱情是一种考验，这是一个古老的、任何时

代都无法回避的主题，以单纯的爱情主题写成长篇小说，如果写得好，能显示作者的功力。”

谈到小说和诗歌写作的关系，韩东提到一个细节，在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里，诗和文，常常是一起出现的，文叙述事件，诗带有形容性或说明性的功能。“这种结合，给创作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，各种艺术形式都一样，比如电影《黑暗中的舞者》，它是一部剧情片，但演着演着就唱起来了。形式的创新之下，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思考。”

如果从写作角度来讲，韩东认为小说和诗歌的区别在于：“写小说是一个日常性的工作，每天都在进行，或许不一定是在写作，可能是在阅读、思考、收集素材，或在修改打磨；但诗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东西，不太可能被纳入日常写作，不是说有点儿空闲或者灵感就可以写诗，这是对诗的误解。”

口语化，是韩东作品的一大烙印，无论诗歌还是小说。这个创作特色也给韩东带来了两极分化的口碑。喜欢的人，觉得他就像自己身边一个爱讲故事的大叔，絮絮叨叨地讲着家长里短，虽然有点俗气，但非常真实；诟病他的作品的人，往往批评他的小说缺乏文学性，又不具备大众文学应有的紧张激烈、百转千回的情节设置。

文学批评家吴亮认为：“看韩东的小说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，韩东像白居易，非常直白，叙述语言干净透彻，用词准确，态度亲切毫不含糊。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出自过去的时代，没办法马上把读者抓住，读者需要具备一点经验，唤起一些回忆。”作家苏童则认为韩东就是中国的雷蒙德·卡佛（美国小说家、诗人），参照一下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小说的定义：“表面的平静，主题的普通，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叙事，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……”与韩东的小说还真有几分神似。

## 老年人是一个巨大群体 也应该是重要的文学课题

韩东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：“我们今天写的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已经不一样了。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达到了高峰，难以超越，

那么今天我们该朝向怎样的审美目标？我认为，一方面要有中国味儿，写有中国趣味的小小说，和中国古典小说又不一样；另一方面，我们的写作还是要跟世界接轨。”

自从大学毕业，韩东在高校教了十年书，但对上讲台还是不适应，因为他更喜欢互动，而不是宣讲、灌输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辞职后买了台电脑，在家写作。广东作协文学院面向全国招聘作家，韩东和余华、东西等人共同入选，每个月发800块钱，为期两年，在当时来说，可谓高薪聘请。后来他又担任了《芙蓉》杂志的组稿编辑，推出了一批“70后”“80后”小说家，点燃了他们的文学梦想。韩东说：“我不反对挣钱，不反对物质，但也不追求物质生活，即便有钱，我也不乱花。”

最终，他到《青春》杂志上班，直至退休。《青春》由南京市文联主办，是韩东的父亲方之在1979年创办的，遗憾的是，创刊号刚刚问世，方之便去世了。早期，韩东的哥哥李潮在《青春》当编辑，刊发过先锋作家代表人物马原的小说。

2022年8月25日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，韩东凭借诗集《奇迹》获得诗歌奖。当时他正在修改一部中篇小说，接到了祝贺电话，才知道自己获了奖。这一年韩东61岁，已经退休。很多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的文学青年，无法相信他们的文学偶像已经老去。

韩东说：“我拿到了老年人证，到公园或什么地方去，票价都可以减半了。中国的老年人是一个巨大的群体，我想也应该是重要的文学课题。我们有太多写青春、写儿童的文学作品，当然，儿童非常可爱，是祖国的未来，青春的激情与冲突非常戏剧化，但是我想，对老年人生活的书写，也应该有所创新，也是有意义的。”

他依旧每天早上前往工作室写作，一直到下午5点，收工回家，日子过得既简单又自由。“叶兆言、于坚也是一样，作家都一样，整天写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写作这件事的确包含了苦力部分和工匠部分，做其他事如果要做好，想必也是一样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这是主动上班，比起被动在单位上班被人管，要自由得多。”花甲之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，韩东足以羡慕旁人了。对于未来，他承认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“野心”，“会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写两三部长篇小说，还想再拍一部电影。”

## 韩东访谈

### 打破观念分野 写出优秀作品

问：2017年，您编剧、执导，贾樟柯监制的电影《在码头》公映，这部电影参加了釜山、休斯敦国际电影节，也拿到了一些奖项，没有空手而归，可以说得到了专业领域的肯定。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，怎么会想到去拍电影？这其实在文坛并不多见。

韩东：这部电影改编自自我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几个年轻诗人偶然卷入一场与地痞、保安的莫名其妙的故事。拍电影，也得拍电影，完全是因为长期在家写作，生活太单调了，想寻求改变。再加上我和一些文艺电影的导演常来常往，接触久了，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些想法，想上手试试，但我毕竟是外行，于是找到贾樟柯，想请他当监制。我们是老朋友了，他也很愿意帮我做这件事。

问：您做导演，给人直观的感受就是拍独立电影，可以说与市场、与票房是脱节的，您怎么看？

韩东：我很怀念章回小说的时代，没有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区别，但写得特别好，它作为一种小说形式，非常成熟。现在所有小说观念的分野，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，电影圈里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分野，都应该打破。比如写畅销书，你得写像《教父》这样的畅销书，它的价值不亚于一部有品质的严肃小说。拍电影，也得拍像《教父》这样的电影，那片子拍得多好啊，艺术性和商业性达到了完美统一。

问：做了导演，有什么感悟？

韩东：其实在我心里，写作是一个大概念，与做导演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这种“轮番耕作”，对我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滋养。因此，我非常投入地去做完了这部电影，以专业的态度，去做好一项业余的工作。

问：您怎么评价文艺腔的作品？

韩东：文艺腔没有创造性，作为写作者，我们需要创新，太文艺了就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，比如各种金句。我打过一个足球运动员和球迷的比方，球迷对足球运动津津乐道，甚至如指掌，反倒是球员看上去不那么在行，不会踢球，不懂足球。其实，球迷没什么不对，但让他下场踢一把看看，肯定不行。他的本质是消费者、收集者、模仿者、评论者，而一位真正的球员，对足球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需要文艺，但写作者真的不能那么文艺。

问：您怎么看看待写作这件事？您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作家吗？

韩东：写作令我着迷和上瘾。整体来说，写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大部分时光是痛苦的，但为了那一段高潮的体验，我宁愿经历所有痛苦。我把宝都押在写作上了，写作不单是我的一项技能，也是我的身家性命，甚至是我的全部。

我不认为科技手段会直接作用于文学，至于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写作，能否写出杰作，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写出好作品，我表示欢迎。因为真正好的作品，有就可以了，管它是出自人类还是非人类？如果总是担心并非出自人手，那就狭隘了，就像一个作家妒忌另一个作家的成就，可以理解，但我无法认同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## 讲述

### 自上世纪40年代起，这户普通人家一直住在人民公园附近 我家几代人的记忆地标

口述 万丽君 撰文 张建

万丽君的父亲万强，1938年出生在河北省永清县南大王庄，后定居天津，在人民公园附近住了大半生。万丽君出生于此，对这个家庭来说，人民公园是重要的记忆地标。

#### 祖父拖家带口来到天津 父亲儿时常在李家花园附近玩

我的祖父在外面闯荡多年，最后落脚在天津。因为他找了一个好事由（天津海关勤务工），相对收入比较高，又很稳定，便让他的母亲、妻子、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一起来到天津。起先住在回力球场附近（今意式风情区）的海关宿舍，因人口太多了，实在挤不开，我祖父就通过中间人租了两间房，在哪呢？南昌路南端、毓华里旁边沿街的一个院儿，距李善人家的花园也就几十米。

老家还有二十多亩地。开始那几年，每到春秋两季，我祖母就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家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雇短工，平日由我的一个干爷爷给照看着。当然，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生活。

我大伯和我父亲小时候常到李家花园附近玩。那时，花园四周没有

围墙，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，从外往里看，几乎见不到房子，全是杂草和树木，尤其到了冬天，荒芜一片，谁也不敢往深处走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哥儿俩钻过李家花园铁丝网去解大便，半截忽听见草丛里发出窸窣窣的声响，吓得我父亲直哆嗦。我大伯说：“甭怕，是刺猬！”这下我父亲更嘀咕了，别扎了屁股！我大伯拾起一块土坷垃想扔过去，我父亲赶紧拦住他：“别扔，那是‘大仙’！”因为我祖父讲过，狐狸、刺猬、蛇、黄鼠狼子都是“大仙”，不能惹。那年我父亲才4岁，回到家，我大伯告状，说我父亲迷信，祖父一听也笑起来。

我父亲6岁那年，全家人从南昌路搬到保定道57号，也属海关宿舍。这是一所小洋楼，楼上住着一户外国人，我们家住在楼下。这期间，我父亲就在耀华中学对面的立德小学上学了，中间隔着墙子河。学校就两间教室，楼下一、二年级在一屋，楼上三、四年级在一屋，校长姓查。我祖父觉得这么凑合着过不是长久之计，还是想再租房。

1948年，我们家又搬到李家花园附近的九和里。九和里是一条胡同，左手四个院为单号，右手五个院为双号，胡同口在无锡道。我们家租的房子是6号院，房主姓陶，原是小



万丽君 摄影 张建

楼张顺兴西服店的师傅，手艺相当好。起初，陶家两口子加上儿子一家住在西边的三间房子里，两间南房住着陶的母亲，两间北房伙计们加工服装使用。后来，陶师傅岁数大了干不动了，儿子又好吃懒做，就把北房租给了王家，南房租给了我们家。我父亲也从立德小学转到苏州道与南昌路把角儿的四维小学（后改为光华小学，又改为三义庄小学）。

天津解放前夕，我祖母陪着我大伯回老家探亲，等完了事，再想回来就进不来了，天津外围戒严，局势非常紧张。九和里的住户都备足了水和粮食，把玻璃用纸条贴成“米”字，

床铺架起来，晚上躲在底下睡觉。街坊邻居在胡同口的栅栏门后面，用沙袋垒起一人多高的防护墙，严防国民党残兵闯进来抢东西。

攻城的头几天，枪炮声不断，最密集的是1949年1月14日，到15日下午，大街上就有人喊了：“解放军进城啦！”我祖父胆子真大，扒开胡同口的沙袋就出去了，边走边喊：“欢迎解放军，欢迎解放军！”就见解放军大部队从南昌路跑步向北行进。转天早晨，有邻居说：“你们看，无锡道多干净，解放军在马路边上住了一宿，出发前都给扫干净了！”

#### 1949年天津解放后 我父亲走入李家花园

1949年春节前，我祖父想到李家花园看看，带着我父亲出了门。九和里到李家花园很近，父子俩溜达溜达就到了，小心翼翼地往深处走。园子里静悄悄的，很杂乱，走到一座古建筑前，有些阴森恐怖，所有的门窗都没有了，屋里黑洞洞的，再仔细看，地上没烧尽的卸下来的门窗，依然散发着焦糊的味道，可能是国民党兵在这儿烤过火。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见两棵树之间拦了一条绳子，中间挂着一张纸条，上写：“小心地雷。”我祖父下意识地把父亲拽到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咱回去吧。这是解放军探出来的地雷，万一有的地方没探到，踩上就麻烦啦！咱怎么进来的，就怎么回去，千万别往岔道儿上走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家把花园献给国家，改为人民公园。我父亲觉得非常新鲜、兴奋，就想围着公园走一走。当走到现在的琼州道时，眼前呈现一片绿油油的菜地，一畦一畦的，

不知种的什么。他十分好奇，见周围没人，就悄悄踏上了田埂，心想能拔俩萝卜也行啊！可是没走几步，两脚就沾满了黄泥，越踩沾得越多，正低头琢磨怎么办时，走过来一个大人：“你这干嘛？”我父亲不知所措地抖着手：“看……看着新鲜。”“有啥好看的？你还不懂刚下雨不能踩吗！踩坏了我不重罚你。你还是个学生呢！”那次挨数落，给我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人民公园的西边，几乎都是平房，叫谦德庄，核心区非常热闹，有点儿像南市“三不管”。在汕头路附近，有一座百花电影院（后改称战斗影院），它的前身是浙江义园，是在天津经商的浙江籍人士出资盖的一间大房子。规模跟小剧场差不多，临时停放逝者的棺材，再找机会运回浙江老家。后来，这间房子改造成了电影院，观众就坐在架棺材的长条板凳上看电影，往后才添置了正式的座椅。

#### 在人民公园看马戏 小丑的眼睛能溢水

1958年，我父亲在天津卫校教书。天津卫校在广东路1号，校舍是原来的美国兵营，面向全国招生，一些外地学生或家里比较困难的学生，放寒暑假也不回家，仍在学校食堂吃饭。这一年春节，我父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，要逛逛人民公园，定在正月初七这天。那时游园是件很高雅、很奢侈的事，最起码得舍得买门票吧。他们有的笑，玩得很尽兴，漫步到塔山附近，看见公园的流动摄影师正在给游人拍照。他们跟摄影师打了招呼，爬到山上，把外套脱下来搭在石山上，按照摄影师的提示摆好姿势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1959年，我父亲被分配到天津体育学院担任天津足球队队医，刚到单位，领导就让他到保定参加医药用品展览会。他就当地买了一顶剪绒帽子，戴上后感觉挺英俊，回天津后，就想拍张照片。只有这顶帽子也不配啊，他又穿上了我祖父的呢子大衣，围上了毛线围脖，来到人民公园。专职摄影师带他到汉白玉老石桥边，按下了快门。

我出嫁前，始终在九和里，跟着爷爷、奶奶一起住。爷爷、奶奶特别疼爱我，和弟弟、隔几天就带我们到人民公园打滑梯、看动物。有一年，人民公园请来了苏联大马戏团，轰动一时，根本买不到票。爷爷就推着竹编的儿童车，带着我和弟弟到公园去等富余票。开场大约5分钟，还真等着了一个退票的。爷爷买了票，推着小车带着我们进了大棚，正看到马术表演。最让我开心的是头一次看见小丑的眼睛往外溢水。散场后，我一个劲儿地问爷爷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告诉我，小丑的胸口藏着一个水袋子，两根小细管通到眼睛，用力一压，水就溢出来了。我听后信以为真。后来这成了我们家大人常说的一个笑话。

我交男朋友也是在人民公园见的面，其中还有一段儿事：俩人约定好，在人民公园正门见面，我还特别强调，毛主席题字的牌子的那个门。结果，我在徽州道与厦门路交界的公园门口等候，男朋友则在广东路与琼州道交界的公园门口等候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不见人影，俩人都很失望，都想对方肯定不乐意。我骑着自行车沿徽州道往前走，男朋友骑着车从广东路也拐到了徽州道，俩人这才碰上面！原来，他不知道人民公园还有个大门，以为看见毛主席题字就没问题了，而我不记得人民公园后门也挂着毛主席的题字，双方闹了个误会。